

·创新创业与企业管理·

# 初始资源、战略匹配度、创业学习与 新创企业成长效应



□陈明森 刘荷 陈心颖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产业与企业发展研究院 福州 350108]

**[摘要]** 初始资源、创业战略、创业学习是创业理论的重要范畴,但不少研究往往割裂范畴之间内在联系,孤立分析上述因素对新创企业成长影响,难以适应动态复杂的环境变化,也与高度能动性创业活动的实际情况不吻合。借鉴资源基础理论的分析范式,构建“初始资源-创业战略-企业成长性”新分析框架,并将创业战略模式具体化为新企业对创业机会来源和创业合法性方式的选择组合,引进创业学习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通过对266家新创企业的问卷调查,构建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初始资源禀赋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直接积极影响。(2)战略模式选择的成长效应不显著,但初始资源结构与创业战略模式之间内洽性和匹配度,则对新企业成长具有显著中介效应。(3)创业学习是重要调节变量,但不同学习方式对不同创业路径的调节效应具有差异性和不确定性。

**[关键词]** 初始资源; 战略匹配度; 创业学习; 新创企业成长

**[中图分类号]** F27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4071/j.1008-8105(2023)-1021

## 引言

创业资源是新企业创建和成长基础支撑,也是创业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产生资源基础理论、资源依赖理论、资源拼凑理论、企业能力理论、企业知识理论等,试图从企业资源和能力视角,解释企业竞争优势终极来源以及绩效存在持续差异内在原因。基于创业资源视角的创业理论,强调创业资源特别是异质性资源在创业活动中地位与作用,提出以创业资源为导向的创业研究基本路径,取得较大进展,对创业实践和创业理论研究起着一定指导作用,但也存在某些缺陷与需要继续完善之处。

首先,对创业企业初始资源分类,与成熟企业

资源分类混为一谈,缺乏差别对待,如何从创业导向维度划分创业资源类型、研究初始资源基本结构性特征及其积累、获取特殊规律,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其次,资源基础论提出“资源-战略-绩效”分析框架。但分析范式过于抽象,对内在的作用机理和传导机制缺乏深入探讨,特别创业初始资源禀赋和结构差异如何影响企业战略,而企业战略又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缺乏深入分析,某些领域还是处于空白状态。多数研究对分析框架中创业战略仍作为“黑箱”对待,本质上是描述性的概念,缺乏分析架构和可操作量纲,难以用数量分析的方法加以量度。第三,初始资源、创业战略、创业学习是创业理论的重要范畴,但现有研究往往割裂这些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直接、孤立分析上述因素对新创企

**[收稿日期]** 2023-08-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3BGL030); 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19CGL005)。

**[作者简介]** 刘荷,博士,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产业与企业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陈心颖,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产业与企业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通信作者]** 陈明森,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产业与企业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兼职研究员。E-mail: chms47@163.com。

**[引用格式]** 陈明森,刘荷,陈心颖. 初始资源、战略匹配度、创业学习与新创企业成长效应[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4, 26(1): 1-14. DOI: 10.14071/j.1008-8105(2023)-1021.

**[Citation Format]** CHEN Ming-sen, LIU He, CHEN Xin-ying. Initial resources, strategic fit,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nd new venture growth effects[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4, 26(1): 1-14. DOI: 10.14071/j.1008-8105(2023)-1021.

业成长影响,难以适应动态复杂的环境变化,也与高度能动性创业活动的实际情况不吻合,从而降低对创业问题研究的解释力和可信度。

本研究借鉴资源基础理论的“资源-战略-绩效”分析范式,构建“初始资源-创业战略-创业成长性”新分析框架,并将创业战略具体化为创业机会来源和创业合法性形式的选择。创业初始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创业战略选择,而既定创业战略又会强化初始资源的积累和集聚,二者之间内洽性和匹配度,成为创业初始资源与新企业成长性之间中介变量,并受到双元学习能力的直接或间接调节,形成新创企业成长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本文主要理论贡献有以下三点:一是在批判性吸收国内外理论界对企业资源分类研究基础上,根据新企业初始资源短缺性非均衡性和个体性等特点,提出新企业初始资源构成三元素主张,分别探讨以财务资源、技术资源、社会行政网络资源为导向的创业路径差异与基本特征。二是按照机会发现与机会创造、市场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等不同视角与不同组合,提出创业战略的四种模式,探讨创业战略模式与初始资源结构的匹配度范畴。研究发现,新企业成长效应与战略模式选择呈现弱相关关系,而与初始资源与战略模式匹配度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三是在“创业资源-初始资源与创业战略匹配度-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中,引进外生调节变量,考察双元创业学习对新创企业成长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创业学习对初始资源与新企业成长具有显著正向直接调节效应,但不同学习方式对初始资源导向创业路径的调节作用则具有不确定性。

## 一、初始资源对新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一) 初始资源对新创企业成长的直接影响

企业是系列资源束的集合体,初始资源是新企业创建和成长的重要要素,特别是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难以替代异质性资源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sup>[1]</sup>。企业资源是由不同种类和要素构成,大而概之可分为三大元素资源:一是财务资源。主要指货币资本,以及通过货币从市场上购买所有物质资源和劳动资源,诸如土地、厂房、机械设备、原材料、劳动力等。一定财务资源和物质资源积累是新企业创业必要条件,但由于它具有可购性、通用性、可复制性,无法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二是技术资源。包括专有设备、专利、诀窍、

经营管理知识等,无论是科技型还是非科技型创业企业都必须依托于一定的技术,离不开对技术资源的需求,特别是具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替代的技术,成为企业战略性资产和核心竞争重要来源。三是网络资源,包括市场关系网络、社会行政关系网络等。市场关系网络为正式关系网络,往往基于长期商务交往而形成相互信任关系,具有明确的利益与义务,并以组织为背景而存在。社会行政网络为非正式关系网络,主要基于血缘、长期交往、相互信任以及个人背景为基础<sup>[1]</sup>。网络关系可为企业带来技术、信息、知识及其他资源,有助于企业发现、识别商业机会,而且还可以通过社会关系,获取合法性以及市场难以获取的具有公共性、垄断性的资源和非市场准入机会。

与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相比,处于创业期的新企业初始资源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初始资源短缺性。与成熟企业相比,创业者往往存在新进入缺陷,实力不足,信用匮乏、缺乏社会网络,合法性较低,难以从外部获取资源<sup>[2]</sup>。其初始资源主要以创业者自身内源性资源为主,资源数量较少,特别是一些具有价值性、独特性和难以模仿性的核心竞争力资源更为稀缺,难以长期支撑资源消耗,大量创业企业就是因为资源枯竭而导致死亡。二是以个人资源为主。主要表现为:财务资源个人化。企业资金主要源于个人、家庭积累以及亲朋好友投资,初创企业信用融资的渠道不畅、规模很小,不少企业债务要以个人名义承担无限责任。技术资源个人化。技术资源主要源于个人的专利技术或专有技术,少有企业的专利。创业学习只是停留在个体学习层面,还无法转化为团队学习和组织学习。市场网络资源个人化。重要客户和供应商资源往往是掌握在少数管理者手中,形成客户和供应商只认个人,不认企业的现象。三是初始资源权力集中性。新企业创立初期往往始于个人行为,财务资源、知识资源、关系网络资源也高度集中于创始人,多数时候创始人既是出资者,又是企业家、经营管理者,对企业具有绝对控制力。在新企业发展过程中,随着增资扩股造成创始人财务资源逐步稀释,以及知识资源、社会性资源向创业团队乃至管理层扩散,控制权也随着逐步稀释,最终可能出现终极所有权、法人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sup>[3]</sup>。

创业初始资源是新企业生存、发展基础,对创业企业的绩效与成长有重要的正向影响作用<sup>[4-5]</sup>。财务资源数量决定物资资源的投入规模,技术资源决定投入产出效率,构成新企业成长的供给约束;

而市场资源构成企业成长的需求约束。新企业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既不能超出所能获得的资源供给数量,也不能超出所能得到的市场需求份额。 $T \cdot t' \geq P \leq S \cdot s'$ ,其中 $T$ 代表资源投入, $t'$ 代表主要由技术决定资源投入产出效率, $P$ 代表新企业生产规模, $S$ 代表新企业所处行业的市场总量, $s'$ 代表新企业的市场占有率<sup>[6]</sup>。上述资源约束为短边约束,当资本资源约束为短边时,以资源约束为主,市场约束无效;当市场资源约束为短边时,以市场约束为主,资本约束无效。一般而言,在企业初创阶段,基础性资源较为匮乏,而且新企业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资本、技术、网络等显性资源,不仅是创业活动必备初始资源,而且起着资源承诺的作用,提升初创企业的合法性和社会影响力<sup>[7]</sup>。

假设1:初始资源禀赋对新企业成长具有直接正向影响效应。

(二)初始资源结构与创业战略匹配度及其对新企业成长影响

### 1. 创业战略:机会来源与合法性路径选择组合

创业战略是新企业对所处环境的响应方式,既与组织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自身资源约束,是在既定资源约束条件下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所作出的方向性选择。基于重点目标选择差异,进而形成不同企业发展战略风格。迈克·波特企业竞争战略理论,侧重于价格、产品与市场细分;德鲁克的战略管理理论则高度聚焦于消费和顾客,其核心就是“引导消费、创造顾客”。本文则从新创企业的创业机会与创业合法性选择的双重视角,探讨创业战略,并将其定义为创业机会来源和创业合法性方式的选择组合。

创业机会来源包括机会发现和机会创造两个方面<sup>[8]</sup>。机会发现亦称科兹纳型机会<sup>[9]</sup>,是创业者意识到市场上存在某种未被满足的需求而尝试寻求某种产品或服务来满足这种需求的过程。机会创造亦称熊彼特机会,强调对市场均衡的“创造性破坏”,是创业者通过主动性、前瞻性行为,创造、开发新产品或新服务的过程<sup>[10]</sup>。创业机会既是独立于创业者之外的客观存在,又是与创业初始资源结构以及创业者个人特质密切相关。

合法性则是指新创企业经营活动以及提供产品

服务,与经济社会结构体系的内在需求、法律规范乃至社会认知的一致性、恰当性和合意性程度。企业合法性主要包括市场合法性、社会合法性等方面。市场合法性来源于市场客户、供应商等最直接利益相关者对产品或服务价值的评价、判断及其切身感受,这一实际结果将决定他们是否支持企业<sup>[11]</sup>。社会合法性来源于社会团体、社区居民、政府部门等认可、支持,其关键是将组织结构嵌入到制度环境中,使得新企业组织与制度环境保持同构<sup>[12]</sup>,以获得社会、政府认可和政策支持。对于成熟企业而言,上述两种形式的合法性必须同时并存、缺一不可。但对于新创企业而言,由于处于合法性获取、积累阶段,合法性各种形式不可能均衡存在,而是处于非均衡状态和动态演化过程,随着时间推移,会依次采用具有递进功能的不同合法化战略<sup>[13]</sup>。有些企业以市场合法化为主,逐步向社会行政合法化演进;有些企业则以获取社会行政合法化作为起点,逐步向市场合法化演进。

战略就是选择。创业机会与创业合法性路径的选择顺序与不同组合,构成新企业四种创业基本战略模式:战略模式I,即机会发现-市场合法性为主的战略组合;战略模式II,即机会发现-社会合法性为主战略组合;战略模式III,即机会创造-市场合法性为主战略组合;战略模式IV,即机会创造-社会合法性为主战略组合。如表1所示。

### 2. 初始资源结构与创业战略选择的匹配度

与成熟企业相比,新创企业初始资源匮乏,而且分布不均衡,资源配置具有较大结构差异性,有些企业以财务资源为主,有些企业以技术资源为主,有些企业则以社会网络资源为主,进而形成不尽相同的初始资源结构。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创业战略选择不是随心所欲,是以一定初始资源禀赋为基础,并与初始资源结构相适应。特定初始资源结构决定新企业战略选择方向,而创业战略选择又会进一步强化资源积累与资源集聚方向与结构,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伴而行<sup>[14]</sup>,称为初始资源结构-创业战略匹配度。

资源承诺是新企业捕捉或创造创业机会的关键,不同初始资源结构导致不同创业机会来源。一般而言,拥有丰富关系网络资源的创业者,具有广

表1 创业战略模式

	战略I	战略II	战略III	战略IV
机会来源	机会发现	机会发现	机会创造	机会创造
合法化路径	市场合法性	社会行政合法性	市场合法性	社会行政合法性

泛市场关系和非市场关系, 拥有各种各样信息来源渠道, 具备对外部市场环境敏感性和警觉性, 有利于市场机会发现、捕捉。以技术为主的创业资源结构, 则有利于创造、开发新产品或新服务, 通过对市场均衡的“创造性破坏”, 创造新供给与新需求, 构建创业新机会<sup>[15]</sup>。而具有丰富财务资源的创业者, 既易于调动大量资源, 实施创业机会发现和开发, 也便于通过要素市场购买相应技术、聘用专业人才, 进行创业机会创造<sup>[16]</sup>。当然由于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往往难以通过市场购买, 财务资源的机会创造能力要弱于具有原创核心技术的创业者。

创业资源也是构建企业合法性的基础, 是缺乏品牌和社会信用新创企业向外界释放一种重要信号, 但不同资源结构获取合法性路径不尽相同。一般而言, 以财务、技术等资源为主新创企业, 往往是从市场合法性起步, 凭借其资本、技术相对优势进行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 并通过溢出效应逐步获取制度合法性<sup>[17]</sup>, 财务、技术资源与顺合法化路径具有较高契合度。拥有关系网络资源比较优势新创企业, 既可以利用市场关系网络资源, 实施以市场合法化为先导的顺合法化路径, 也可以利用非市场关系网络资源, 实施以社会资本、行政资源为先导的逆合法性路径。

综上所述可知, 以技术为主的初始资源结构, 有利于机会创造和市场合法化, 与战略模式III具有较高匹配度, 而与模式II的匹配度较低; 以财务资源为主的初始资源结构有利于机会发现和市场合法化, 与战略模式I具有较高匹配度, 而与模式IV的匹配度较低; 以网络资源为主初始资源结构, 有利于机会发现和非市场合法化, 与战略模式II具有较高匹配度, 而与战略模式的匹配度较低。

### 3. 资源结构与创业战略匹配度对新企业成长的影响

创业战略对新企业成长的影响, 不在于战略模式选择差异, 无论是创业机会来源差异还是创业合法性路径选择, 无论战略模式I、II、III还是战略模式IV, 对新企业成长性影响都是中性的, 并无好坏优劣之分。许多新企业创业失败, 并不是战略本身不合适, 而是制定战略过程出了问题<sup>[18]</sup>。按照资源管理理论, 企业战略本质就是在外部环境条件约束下资源编排活动, 包含资源构建、资源束集与资源撬动等三个层次的行动过程<sup>[19]</sup>。创业战略选择就是企业资源编排活动, 首先受到初始资源约束, 创业机会来源与创业合法性路径选择都必须与企业资源禀赋与资源结构相适应; 而创业战略模式一旦确

立, 就必须以相应战略为导向, 进一步进行外部资源获取和内部资源整合, 二者之间形成因果累积循环效应。条条道路通罗马。创业战略成长效应不是来自战略选择本身, 而是来自创业战略与初始资源禀赋的自洽性、协调性和相互依赖性<sup>[20]</sup>, 即企业战略模式与初始资源结构的匹配度, 匹配度越高其成长效应越好, 反之则反是, 匹配度成为创业企业初始资源与新企业成长的重要中介变量。如表2所示。

表 2 资源结构与创业战略模式匹配度

资源结构	创业模式I	创业模式II	创业模式III	创业模式IV
技术资源为主	中	低	高	中
财务资源为主	高	中	中	低
网络资源为主	中	高	低	中

综上所述可得出如下假设:

假设2: 创业战略模式选择受到资源禀赋与资源结构约束, 而既定创业战略又会影响初始资源集聚与积累, 二者之间自洽性、匹配度越高, 新企业成长效应越好。

### (三) 创业学习: 初始资源导向创业路径的内生调节变量

创业学习是指新企业对知识获取、共享、创新等活动。从知识获取方式考察, 创业学习可分为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 前者源于对现有知识判别、获取和应用; 后者源于对知识生成、创新。创业学习对创业路径调节效应包括直接调节效应和间接调节效应, 前者是指创业学习对初始资源与企业成长之间调节, 直接影响新企业的成长效应; 后者是指创业学习对初始资源结构与创业战略之间调节, 通过调节初始资源与创业战略的匹配度, 间接影响企业成长效应。

与成熟企业相比, 新创企业主要劣势是缺乏前期的经验积累和必要知识存储, 所以在借鉴他人成功经验基础上, 进行知识迭代创新, 既可以拓展初始资源来源渠道, 又有利于创新资源利用方式, 可以直接提高资源投入产出效率。但由于不同企业存在资源结构和发展战略差异, 不同创业学习方式的间接调节效应存在一定差异。

财务资源、网络资源和机会发现为主导创业路径, 源于创业者对客观环境的注意力、警觉性和机敏性。利用式学习正是创业机敏性学习, 有利于提升对外界环境的信息处理能力、搜索技能、信息扫描习惯以及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等, 使得他们在获取信息方面更有优越性。同时, 利用式学习也是调

适性学习，有利于加强对外部知识的吸收复制以及对内部知识的精炼整合，促进个人先前已有知识与周边环境信息交互融合，构成某种机会随机浮现的临界平台，减少机会盲点和控制力错觉的影响<sup>[21]</sup>。但是以模仿复制、经验学习为特点的利用式学习会形成情景依赖性知识，特别是在技术快速变化情况下，容易造成机会陷阱，降低学习承诺与学习效果，进而影响技术资源导向新企业的成长效应。

技术资源和机会创造为主导向创业路径，主要特征是以新产品、新技术为牵引的机会创造和市场创新，创业者往往缺乏先前或他人的应对经验和惯例加以借鉴，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探索性思考以及创造性想象能力<sup>[22]</sup>。这就要求新企业不仅要加强利用式学习，更要突出探索性学习，需要创业者破除思维定式，主观感知环境并在内心世界进行相应解释，发挥创造性想象力，通过系统迭代地思考，打破现有环境、市场的约束，创造“无中生有”的新机会和新市场。财务资源与社会网络资源为主的创业路径以利用式学习为主并辅以适当的探索式学习。

假设3：创业学习作为自适应机制，正向调节初始资源与新企业成长关系，可以放大新企业成长效应。

假设4：利用式学习正向调节财务或网络资源与创业战略模式I和创业战略模式II的匹配度，进而对企业成长性产生积极作用，但对技术资源为主创业路径的调节作用不甚明显。

假设5：探索式学习，正向调节技术资源与创业战略III和创业战略模式IV匹配度，进而对企业成长性产生积极作用，同时对以财务资源或网络资源为主的创业路径的企业成长性亦有一定的直接或间接的调节作用。

## 二、实证分析

### (一) 有调节中介效应模型框架

初始资源导向创业路径成长效应函数中，初始资源禀赋为核心解释变量，是新企业物质基础，直接影响企业成长效应；初始资源影响创业战略模式，创业机会捕捉、合法化路径选择要与初始资源结构相适应，而特定创业战略又进一步强化特定资源的积累，二者之间匹配度成为创业资源与企业成长的中介变量。创业学习则对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发挥着调节作用。初始资源导向创业路径成长效应函数是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图1所示。

### (二) 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主要采取在线开放式问卷调查法搜集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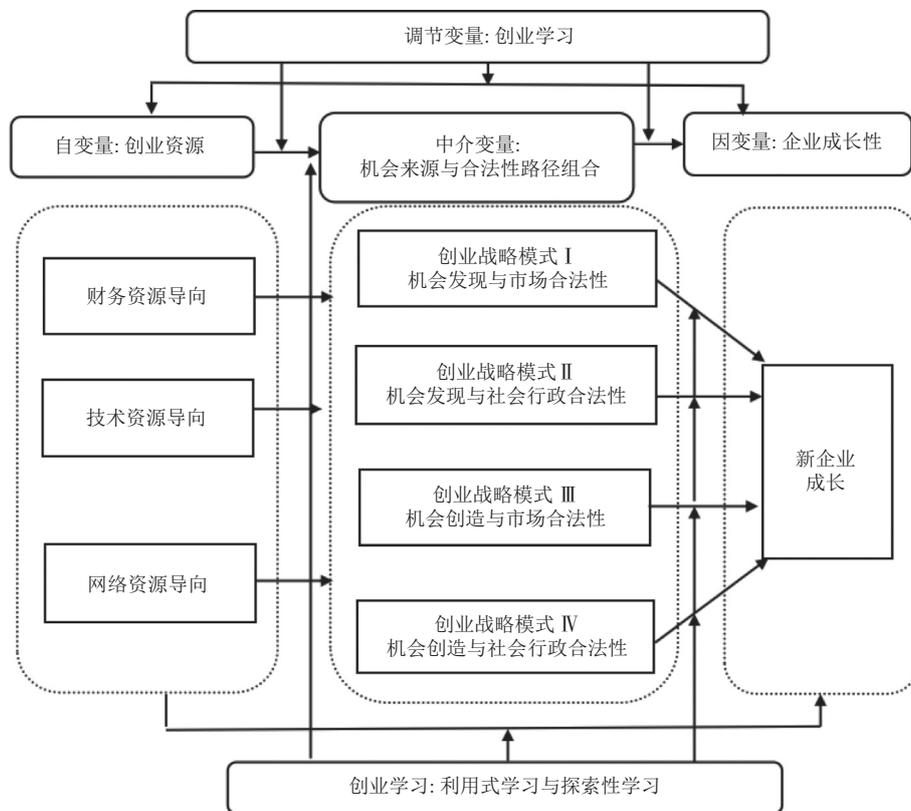


图 1 有调节中介效应的理论模型框架

据, 调查对象为福建企业与企业家协会、福建中外企业家联谊会、福建青年创业促进会、福建职业经理人协会、福建工程师协会、福建海西创业大学等15个企业家微信群, 涉及企业约3 000多家。为保证问卷回收率和回答的有效性、可靠性, 课题组在委托发放问卷的过程中要求委托人员明确调研对象是否符合研究要求, 课题组在答题者填写问卷和回收问卷过程中随时与委托者保持联系, 针对问卷填写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答<sup>①</sup>。根据填写人员意愿, 问卷可采用真名或匿名填写。本次调查共回收样本295份, 其中境外企业有29份, 由于本研究主题是探讨中国境内企业创业情况, 所以予以剔除, 得到有效样本为266份。在问卷填写人中, 以公司高中层管理人员为主, 其中高管占58.98%, 中层管理人员占20.01%。由于通过软件提前筛选, 无效问卷无法提交, 回收的所有问卷均为有效问卷。

针对企业成长性、初始资源、创业机会、创业合法性、创业学习等指标, 共设计了26个问题项, 并采用了李克特七级评分量表 (Seven-point Likert Scale) 的正向计分法, 分值1~7代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或“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各问卷题项基本参照国内外公司创业研究

领域和公司战略管理领域常见的测量指标, 并根据实地访谈与试调查, 进行相应调整与修改的基础上设计而成的。

战略模式是创业机会来源与创业合法性方式组合。根据对创业机会来源和创业合法性路径的测量分值统计, 可将调查企业战略分为四大类: 机会发现与市场合法性组合的战略模式I, 其指标值等于机会发现分值与市场合法性分值乘积; 机会发现与网络合法性组合的战略模式II, 其指标值等于机会发现分值与网络合法性乘积; 机会创造与市场合法性组合的战略模式III, 其指标值等于机会创造分值与市场合法性乘积; 机会创造与网络合法性组合的战略模式IV, 其指标值等于机会创造分值与网络合法性乘积。在每个企业中, 机会来源与合法性路径乘积最高者, 即为该企业主导战略模式。

控制变量指标。包括企业规模、创建年限、行业性质等。创建年限为新企业成立至今时间。企业规模为虚拟变量, 小微企业为0, 大中型企业为1; 行业性质为虚拟变量, 传统产业为0, 高技术产业为1。变量测量如表3所示。

(三) 预调研与小样本检验

为提高问卷各问项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选择福

表 3 变量测量一览表

变量	变量性质	测量指标	测量依据与来源
企业成长性	被解释变量	销售收入增长率; 销售利润增长率	Perters & Watennan (1982) <sup>[23]</sup> ; Ensley等(2002) <sup>[24]</sup> ; 周萍, 蔺楠(2015) <sup>[25]</sup> ; 本研究访谈及有关调查。Chandler和Hanks (1994) <sup>[26]</sup> ;
财务资源		资金的内部积累与外部获取难易程度	Timmons (1999) <sup>[27]</sup> ; 本研究访谈及有关调查
技术资源	解释变量	技术人员数; 技术专利与技术经验丰富程度	Dollinger (2003) <sup>[28]</sup> ; Gilbert, Mcdougall和Audretsch (2008) <sup>[29]</sup> ; 本研究访谈及有关调查
网络资源		创业者与市场、社会、政府机构联系的密切程度	苗淑娟, 刘玉国(2007) <sup>[30]</sup> ; Watson (2007) <sup>[31]</sup> ; 宋晓洪, 丁莹莹(2017) <sup>[32]</sup> ;
创业学习	调节变量	不断获取、吸收、整合和应用相关知识程度	本研究访谈及有关调查
机会来源	中介变量	机会创造体现在技术、产品、商业模式创新; 机会发现体现在创业者对市场与行业变化敏感性。	Atuahene-Gima和Murray (2007) <sup>[33]</sup> ; Scott (2011) <sup>[34]</sup> ; 王兆群等(2017) <sup>[35]</sup> ; Koellinge (2007) <sup>[36]</sup> ; 刘佳和李新春 (2013) <sup>[37]</sup> ; 李剑力 (2013) <sup>[38]</sup> Aldrich和Fiol (1994) <sup>[39]</sup>
合法性路径	中介变量	市场合法性体现在产品或服务的顾客满意度; 上下游企业响应速度等 社会行政合法性体现与社会沟通能力, 获得行政部门的支持程度等。	Scott (2001) <sup>[34]</sup> ; 王兆群等(2017) <sup>[35]</sup> ; 范群鹏和程松松(2018) <sup>[40]</sup>
创业战略模式	中介变量	战略模式系为机会发现、机会创造与市场合法性、社会行政合法性的两两组合, 包括创业战略模式I、II、III、IV。其指标值等于机会来源与合法性路径分值的乘积, 在一个企业中, 指标值最高战略即是该企业的主导战略模式	本文作者研究
企业年龄	控制变量	企业自成立至今的时间	刘佳和李新春(2013) <sup>[37]</sup> ;
企业规模		企业的员工人数与资产总额	杜运周和刘运莲(2012) <sup>[41]</sup> ;
行业特征		企业所在行业	刘冰欣(2017) <sup>[42]</sup>

州市的50家企业开展小范围预调研,回收有效问卷50份。根据SPSS信度分析运行结果,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902,问项满足CITC值均大于0.5,但删去技术资源的问项3与市场合法性的问项3后的整体Cronbach's  $\alpha$ 系数比原来有所增加。原因是问项1“从事技术研发工作的时间很长”能在一定程度上涵盖问项3的内容,故删去问项3。其余问项设置符合信度检验要求。

经过信度检验后,形成了共24个问项的调查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其进行进一步检验。根据SPSS运行结果,各变量的KMO值均大于0.6,Bartlett球体检验的P值也都小于0.001,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随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并检验公因子累计解释方程变异的占比。根据SPSS运行结果,初始创业资源可以提取出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共3个,累计解释方程变异的77.36%;企业成长性提取公因子1个,累计解释方程变异的97.22%;创业机会提取出2个公因子,累计解释方程变异的79.51%;创业合法性可提取出2个公因子,累计解释方程变异的81.21%;创业学习可提取出2个公因子,累计解释方程变异的78.27%。接着采用最大方差法对提取出超过1个公因子的变量进行正交旋转,各问项的因子载荷系数都大于0.5,且各变量公因子提取结果与研究设置相符。

#### (四) 样本企业特征与创业路径描述性统计分析

样本企业主要集中在福建,有192家,占样本企业总数的72.2%;分布在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河南、广西、江西等境内其他省市企业有74家,占样本企业总数27.8%;企业年龄、规模、行业性质等信息如表4所示。根据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收集的数据均值没有异常数值,且满足偏度小于2,峰度小于5,表明样本数据服从正态分布。

从新企业初始资源结构考察,以网络资源为主的企业数最多,达到140家,占比为52.6%;其次为技术资源为主企业,有81家,占比为30.5%;技术资源为主的企业数较少,仅为45家,占比16.9%。这与我国创业活动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人情社会向商业社会、行政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不仅导致大量“制度洞(Institutional Holes)”和体制性寻租行为<sup>[43]</sup>,而且存在大跨度以亲情、友情、人情为纽带的人脉关系和结构社会资本,衍生大量创业机会和创业资源,获取、积累网络资源,通过非市场化合法化路径,可以降低新企

业进入门槛和市场合法化成本,往往成为许多创业者首选。

表4 样本企业基本特征

样本企业特征	样本量/家	比重/%	
企业年龄	1~3年	75	28.19
	3~5年	46	17.29
	5~8年	145	54.5
地域分布	福建	192	72
	境内其他省市	74	28
资产规模	≤2000万元	176	66.2
	>2000万元	90	33.8
员工人数	20人以下	101	38
	21~300人	122	45.8
	301~1000人	40	15
	1000人以上	3	1.2
行业性质	传统制造业	75	28.19
	高技术行业	61	22.93
	农业、服务业	130	48.87
企业创始人	企业高管	65	24.44
	市场营销	62	23.31
创业前职业	技术研发	34	12.78
	行政管理	25	9.40
	其他	80	30.07

从新创企业主导战略考察,采取战略模式I的企业居多,为85家,占全部调查企业数的32.0%,其后为战略模式II、战略模式III和战略模式IV,分别为77家、61家和43家,分别占比28.9%、22.9%和16.2%。从总体考察,新企业所采取的各种战略分布较为均衡。

根据表1初始资源结构与创业战略模式匹配情况,将匹配度分为高、中、低三档。匹配度较高的新企业有135家,占全部企业数的50.8%;匹配度中等的新企业为111家,占比41.7%;匹配度较低的新企业仅20家,占比7.5%。主要原因可能是,愿意填写问卷的企业多是经营状况较好的,而且多数企业成立年限在5年以上,企业资源结构与战略模式经过长期磨合,具有较好的自洽性与协调性。初始资源结构与创业战略模式基本特征如表5所示。

#### (五) 同源方法偏差与信度、效度检验

本文的变量都来源于同一份问卷,为避免同源偏差的影响,借鉴Podsakoff和Organ<sup>[44]</sup>的做法,以哈曼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效应的统计控制,本文将问卷所有问项作为投入变量,以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共提取出特征值大于1的一起做因子分析未旋转时得到的第一个主成分的载荷量为22.08%,并未占到多数,因此同源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同时将实证数据输

入软件SPSS16.0进行分析,以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 )来表示变量信度。SPSS信度分析运行结果显示,全体变量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918,删去任何一个问项后,Cronbach's  $\alpha$ 系数无

增加。各变量的信度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各问项的CITC值均大于0.5,各变量维度的Cronbach's  $\alpha$ 值都大于0.7,符合统计要求,变量的内部一致性获得通过。

表 5 初始资源结构与创业战略模式基本特征

	企业数	战略模式I	战略模式II	战略模式III	战略模式IV
		机会发现+市场合法性	机会发现+网络合法性	机会创造+市场合法性	机会创造+网络合法性
技术资源	81	19	7	43	12
财务资源	45	28	6	8	3
网络资源	140	38	64	10	28
总计	266	85	77	61	43

表 6 信度检验

维度	问项	CITC	删去该项后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	Cronbach's $\alpha$ 系数	
财务资源	Q1	0.633	0.774	0.80	
	Q2	0.648	0.773		
技术资源	Q1	0.656	0.787		
	Q2	0.623	0.790		
网络资源	Q1	0.573	0.784		
	Q2	0.643	0.786		
	Q3	0.649	0.782		
	Q4	0.591	0.798		
企业成长性	Q1	0.633	0.793		0.802
	Q2	0.661	0.787		
创业机会创造	Q1	0.646	0.791		0.828
	Q2	0.698	0.779		
创业机会发现	Q1	0.599	0.821		0.796
	Q2	0.601	0.826		
	社会行政合法性	Q1	0.641	0.772	
		Q2	0.668	0.770	
Q3		0.703	0.781		
市场合法性	Q4	0.715	0.777		
	Q1	0.666	0.769		
	Q2	0.683	0.759		
利用式学习	Q1	0.626	0.704	0.717	
	Q2	0.745	0.683		
探索式学习	Q1	0.712	0.707		
	Q2	0.567	0.713		

本研究利用软件SPSS软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运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KMO值均大于0.6,Bartlett球体检验的P值也都小于0.001,适合因子分析。根据SPSS运行结果,初始创业资源可以提取出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共3个,累计解释方程变异的81.2%;创业合法性提取出2个公因子,累计解释方程变异的80.24%;企业成长性提取1个公因子,累计解释方程变异的65.1%;创业机会可提取出2个公因子,累计解释方程变异的79.6%;创业学习可提取出2个公因子,累计解释方程变异的73.4%。接着采用最大方差法对提取出超过1个公因子的变量进行正交旋转,结果如表7所示。由分析结果可知,各问项的因子载荷系数都大于0.5,且各变量公因子提取结果与研究设置相符。

表 7 因子载荷系数

变量	问项	公因子1	公因子2	公因子3
创业初始资源	Q1	0.795		
	Q2	0.653		
	Q3		0.778	
	Q4		0.753	
	Q5			0.829
	Q6			0.813
	Q7			0.807
	Q8			0.782
创业机会	Q1	0.813		
	Q2	0.755		
	Q3		0.776	
	Q4		0.689	
创业学习	Q1	0.809		
	Q2	0.768		
	Q3		0.726	
	Q4		0.667	
创业合法性	Q1	0.869		
	Q2	0.862		
	Q3		0.880	
	Q4		0.801	
	Q5		0.874	
	Q6		0.799	

再对各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路径系数进行检验,将相关数据输入LISREL软件后,各潜变量的路径系数都在 $p < 0.05$ 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整体模型的拟合系数满足GFI大于0.9、AGFI大于0.8、CFI与GFI大于0.9、 $\chi^2/df$ 小于2、RMSEA小于0.05。相关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每个潜变量的平均变异萃取量(AVE)均大于0.5,CR值均大于0.7,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sup>[45-47]</sup>。

通过SPSS软件对各回归模型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的VIF均小于5,可以认为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回归模型的残差三点图均呈现无序状,可以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异方差问题。再者,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不存在序列相关的问题。

表 8 变量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P值	AVE	CR
Q1---财务资源	0.825	***	0.62	0.76
Q2---财务资源	0.646	***		
Q1---技术资源	0.727	***	0.75	0.86
Q2---技术资源	0.641	***		
Q1---网络资源	0.714	***	0.78	0.87
Q2---网络资源	0.884	***		
Q3---网络资源	0.825	***		
Q4---网络资源	0.889	***		
Q1---新创企业成长	0.932	***	0.82	0.89
Q2---新创企业成长	0.884	***		
Q2---创业机会探索	0.763	***	0.78	0.88
Q2---创业机会探索	0.904	***		
Q1---创业机会发现	0.643	***	0.69	0.83
Q2---创业机会发现	0.751	***		
Q1---社会行政合法性	0.707	***	0.75	0.86
Q2---社会行政合法性	0.857	***		
Q3---社会行政合法性	0.803	***		
Q4---社会行政合法性	0.816	***		
Q1---市场合法性	0.755	***	0.71	0.83
Q2---市场合法性	0.827	***		
Q1---利用式学习	0.81	***	0.71	0.83
Q2---利用式学习	0.717	***		
Q1---探索式学习	0.754	***	0.73	0.84
Q2---探索式学习	0.838	***		

注：表中\*\*\*表示相关系数的P值小于0.001的双侧检验；\*\*表示相关系数的P值小于0.01的双侧检验；\*表示相关系数的P值小于0.05的双侧检验。

### 三、假设检验与结果讨论

#### (一) 初始资源对企业成长直接影响的检验与讨论

为了考察初始资源的直接效应，构建两个模型加以比较。首先以新创企业成长性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仅包含控制变量的M1模型；而后再加入初始资源形成模型M2。模型如图2所示。变量均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各初始资源变量和新创企业成长通过各自所有问项的均值表征。将数据输入SPSS软件，运行结果如表9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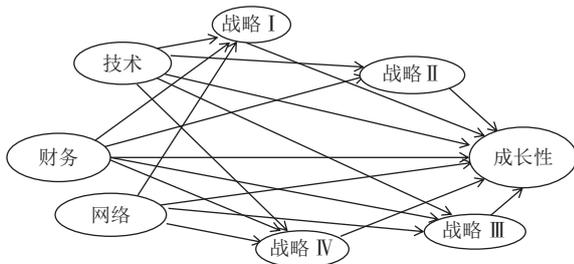


图 2 研究模型

与模型M1相比，模型M2的可调整的R<sup>2</sup>从0.006增加到0.270，能够更好地解释初始资源对新

创企业成长性的影响。财务资源、技术资源和网络资源都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

表 9 初始资源的直接效应

变量名称	M1	M2
企业规模	0.331**	0.210
企业年龄	0.298**	0.102
行业类型	0.078*	0.053
财务资源		0.171**
技术资源		0.202***
网络资源		0.288***
R <sup>2</sup>	0.010	0.277
调整后R <sup>2</sup>	0.006	0.270

注：表中\*\*\*表示相关系数的P值小于0.001的双侧检验；\*\*表示相关系数的P值小于0.01的双侧检验；\*表示相关系数的P值小于0.05的双侧检验。

但从影响系数来看，不同初始资源对新企业成长效应具有差异性。网络资源的影响效应最大，系数为0.288，技术资源的影响效应次之，系数为0.202，财务资源的影响效应相对最小，系数为0.171。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正处于过剩经济时期，市场约束是新企业发展最大瓶颈，拥有市场网络资源、开拓市场，成为新企业发展的当务之急<sup>[48]</sup>。

技术资源的直接效应低于市场网络资源, 主要原因可能是本次调查对象, 以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 高技术产业占比不到23%, 导致技术资源作用可能被低估。财务资源对企业成长直接效应仅为0.171, 对企业成长作用低于市场网络资源和技术资源, 其主要原因可能是, 中国人历来有财不外露习惯, 在调查问卷中, 个人投资可能被少报或瞒报, 加上随着金融市场不断壮大完善, 许多新企业转向外源融资为主, 创业者自身拥有财务资源在创业活动中的作用逐步下降。

### (二) 初始资源与创业战略匹配度对企业成长中介效应的检验与讨论

为进一步考察创业初始资源与创业战略匹配度对新企业成长的效应, 分别对创业战略、初始资源结构与创业战略匹配度, 加以虚拟变量赋值, 并在仅包含控制变量的模型M1基础上, 分别加入战略模式及其与初始资源匹配度, 形成4个新模型。模型M2, 创业模式I为主企业, 赋值1, 其余企业赋值0; 模型M3, 创业模式II为主企业, 赋值1, 其余企业赋值0; 模型M4, 创业模式III为主企业, 赋值

1, 其余企业赋值0; 模型M5, 创业模式IV为主企业, 赋值1, 其余企业赋值0。同时对初始资源与创业战略模式匹配度的高、中、低, 分别赋值7、4、1, 将匹配度纳入回归模型作为解释变量, 新企业成长作为被解释变量, 包括全部样本企业, 形成模型M6。除虚拟变量外的其余变量均进行了中心化处理。SPSS软件的运行结果如表10所示。

由表10的结果可知, 创业战略与企业成长性的关联系数很低, 分别为0.010、0.008、0.011、0.006, 而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不同战略选择对新企业成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而初始资源与创业战略模型的匹配度对新创企业成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影响系数为0.261, 表明二者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在模型M2、M3和M4中, 初始资源与创业战略模型的匹配度对企业成长性, 具有显著正相关, 系数分别为0.265、0.292和0.188。这就验证上述假设2: 创业战略选择对新企业成长性影响是中性的。企业成长效应主要源于初始资源结构与战略选择的匹配度, 二者之间自洽性、匹配度越高, 新企业成长效应越好, 反之则反是。

表 10 匹配度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效应

变量名称	M1	M2	M3	M4	M5	M6
企业规模	0.331**	0.302**	0.427**	0.294**	0.373**	0.212*
企业年龄	0.298**	0.281*	0.261*	0.201*	0.197*	0.183*
行业类型	0.078*	0.028*	0.061	0.024	0.081	0.062
战略模式		0.010	0.008	0.011	0.006	
匹配度		0.265*	0.292*	0.188*	0.160	0.261**
$R^2$	0.010	0.265	0.278	0.246	0.259	0.274
调整后 $R^2$	0.006	0.255	0.268	0.236	0.249	0.268

注: 表中\*\*\*表示相关系数的 $P$ 值小于0.001的双侧检验; \*\*表示相关系数的 $P$ 值小于0.01的双侧检验; \*表示相关系数的 $P$ 值小于0.05的双侧检验。

但在模型M5中, 网络资源与创业战略模式IV匹配度的成长性相关性较弱,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实证结论与理论分析有较大差距, 造成偏差原因可能是: 调查问卷中, 对于企业非市场合法性行为, 主要通过“企业能够得到政府相关政策支持”“创业者与政府相关部门保持密切交流与合作”等题项进行反映, 尽管在设计问卷时, 尽量减少价值判断倾向, 但实际上却无法完全避免, 可能不少创业者尽管拥有较多行政和政策资源, 但怕被认为有走后门、行贿等嫌疑而难以启齿,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问卷答案出现整体性的效度偏差。

### (三) 创业学习调节效应的检验与讨论

首先, 创业学习的直接调节效应检验, 即创业学习对初始资源与新创企业成长性关系的调节检验。在包含初始资源的模型M2基础上分别加入探

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及其与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形成模型M7、M8。变量均进行了中心化处理。SPSS运行结果如表11所示。

与模型M2相比, 模型M8可调整的 $R^2$ 从0.270上升到0.321, 对新创成长效应的解释力有所提高, 总体上证明假设3成立, 即各种创业学习对创业企业成长性均有一定正向调节影响。但不同方式创业学习与各初始资源交互项的显著性和影响系数存在差别。其中交互项“财务资源×利用式学习”“网络资源×利用式学习”“技术资源×探索式学习”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83、0.081和0.095,  $P$ 值均小于0.05; 但交互项“技术资源×利用式学习”“财务资源×探索式学习”和“网络资源×探索式学习”的 $P$ 值均大于0.1,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 初始资源结构对学习方式选择具有很大影响, 以财务、

网络资源为导向创业路径适合于利用式学习，而以技术资源为导向创业路径更适合于探索式学习。

表 11 创业学习的直接调节效应结果

变量名称	M2	M7	M8
企业规模	0.210	0.138	0.010
企业年龄	0.102	0.008	0.004
行业类型	0.053	0.102	0.089
财务资源	0.171**	0.114**	0.103*
技术资源	0.202***	0.129**	0.111*
网络资源	0.288***	0.195***	0.156*
利用式学习		0.085*	0.059*
探索式学习		0.233***	0.182**
财务资源 $\chi$ 探索式学习			0.177
技术资源 $\chi$ 探索式学习			0.095**
网络资源 $\chi$ 探索式学习			0.056
财务资源 $\chi$ 利用式学习			0.083**
技术资源 $\chi$ 利用式学习			0.093
网络资源 $\chi$ 利用式学习			0.081**
$R^2$	0.277	0.322	0.339
调整后 $R^2$	0.270	0.313	0.321

注：表中\*\*\*表示相关系数的 $P$ 值小于0.001的双侧检验；\*\*表示相关系数的 $P$ 值小于0.01的双侧检验；\*表示相关系数的 $P$ 值小于0.05的双侧检验。

其次，创业学习的间接调节效应检验，即创业学习对初始资源与创业战略匹配度的中介调节效应检验。根据不同初始资源导向和创业战略模式的组合从样本企业中选取以下两类企业：一类是以财务资源或网络资源为主，并采取创业战略模式I或II的企业136家，设为第一组；第二类是以技术资源为主，并采取创业战略模式III或IV的企业共55家企业，设为第二组。以初始资源与战略匹配度作为解释变量，以新创企业成长性作为被解释变量，创业学习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分组回归。SPSS的回归结果如表12所示。

第一组是以财务资源和社会网络资源为主新企业。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引入匹配度与创业学习的交互项后，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与创业战略匹配度的交互项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模型的更改统计量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P$ 值均大于0.05，表明创业学习，对以财务或网络为主资源结构与创业战略模式I和创业战略模式II的匹配度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

第二组以技术资源为主的新企业。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引入匹配度与创业学习的交互项后，匹配度与探索式学习的交互项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调节系数为0.183；匹配度与利用式学习的交互项未能

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探索式学习对技术为主资源结构与创业战略III或IV的匹配度的正向调节作用显著；利用式学习对技术为主资源结构与创业战略III或IV的匹配度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以上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探索性学习正向调节技术资源与机会创造的匹配度，进而对新企业成长性产生积极作用，假说4成立。但利用式学习对初始资源导向创业路径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假说5未通过实证检验。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利用式学习对创业路径的调节是慢变量，二者之间需要在长时期学习过程中，逐步磨合才能见效，其回报具有累积效应，越深入地开展学习其调节效率越高，其对新企业创业路径的调节作用具有正向二次曲线影响<sup>[49]</sup>。由于本课题调查对象多为年轻企业，成立5年以下的新企业占比达45.5%，多数处于磨合期，所以多数企业利用式学习调节效应较低且不稳定。

表 12 创业学习间接调节效应结果

第一组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M8	M9
企业规模	0.145*	0.095
企业年龄	0.092	0.024
行业类型	0.103	0.010
匹配度	0.392**	0.347*
探索式学习	0.204***	0.589**
利用式学习	0.215*	0.112
探索式学习 $\chi$ 匹配度		0.313
利用式学习 $\chi$ 匹配度		0.139
$R^2$	0.244	0.272
调整后 $R^2$	0.234	0.273
第二组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M8	M9
企业规模	0.031	0.095
企业年龄	0.003	0.024
行业类型	0.151	0.010
匹配度	0.255*	0.237*
探索式学习	0.234***	0.341*
利用式学习	0.119	0.212
探索式学习 $\chi$ 匹配度		0.183*
利用式学习 $\chi$ 匹配度		0.139
$R^2$	0.257	0.236
调整后 $R^2$	0.290	0.278

注：表中\*\*\*表示相关系数的 $P$ 值小于0.001的双侧检验；\*\*表示相关系数的 $P$ 值小于0.01的双侧检验；\*表示相关系数的 $P$ 值小于0.05的双侧检验。

#### 四、启示与展望

本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表明，创业路径成长效应函数是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初始资源禀赋与新创企业成长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初始资源与

创业战略模式匹配度,对新企业成长起着正向中介作用;创业学习对初始资源导向的创业路径成长效应应具有明显正向调节作用,但不同学习方式对不同初始资源结构的调节程度有所差异。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的创业实践启示:

1. 保持初始资源与创业战略的动态平衡,不断提升二者之间的匹配性和契合度。以初始资源为基础,根据不同资源禀赋和资源结构,选择不同机会来源和创业合法性方式组合方式,不必拘泥于一种战略模式。由于市场环境变化和经济政治体制变迁,可能诱发创业机会与合法性路径变化,而导致创业战略调整,企业应及时调整初始资源结构,培育新创业资源,使资源禀赋、资源结构与变化的创业战略相适应,最大化发挥初始资源与创业战略匹配度的中介效应。

2. 根据不同初始资源结构,选择差异化创业学习方式。以技术资源导向为主的新创企业,应着重探索式学习,为新产品、新技术,创造新机会、拓展新市场,逐步实现市场合法化、制度合法化和社会认知合法化。以财务资源或市场网络资源导向为主的新创企业,在其起步阶段可以利用式学习为主,重点通过模仿学习、经验学习,寻找发现市场机会,借助财务资源或市场社会网络资源比较优势开发产品、拓展市场空间。以社会、行政资源为主的新企业,以利用式学习为主,重点在行政壁垒较高行业寻找创业机会,并在现有政策、法律允许范围内,充分将行政资源转化为创业资源、将行政合法性转化为市场合法性。当然此类创业者也也要注意防止对政治资源过度依赖和滥用,甚至产生官商勾结、腐败贿赂行为,进而导致行政资源的诅咒效应。

3. 提升双元创业学习能力,注重学习方式的调整转换。创业学习是正向影响创业路径与创业成长性的内生调节变量,新创企业必须始终保持创业学习状态,善于从实践中学习、从他人经验中学习,积极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新信息和新知识;要勇于突破原有惯例和传统思维,主动尝试创新的可能性。利用式学习不能限于对他人经验或以往做法简单的复制和模仿,要根据新企业发展进程和环境变化,加以改造和创新,并由个体学习转为团队学习、组织学习,逐步形成具有共同价值观、强烈学习承诺、不断改善心智模式的学习型企业文化。同时在新发展过程中不能拘泥于一种学习方式,根据新企业发展不同阶段,及时调整转换学习方式,以适应各个阶段成长目标、机会来源、合法性方式等变化,最大化发挥双元学习方式对新企业成长效应的

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取得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成果和结论。但由于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在研究过程中,仍然存在某些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

1. 扩大研究样本量,对更多数量和多样化的新创企业开展调查和数据收集,尽可能拓宽数据收集的区域范围,并努力地创造条件,采取更为随机的综合性方法实现高随机性的数据采集,从而提高样本代表性及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准确性,真正实现本研究结论对其他区域的创业企业具有一定普适性。

2. 进一步采用非同源数据进行检验分析,克服量表采用企业管理者自评数据而可能导致个体认知偏差。除了单一采用正向计分式李克特七级评分量表法外,可更为综合地考虑采用因素提取法、直接加总测算法,以及其他一些更为客观而适宜的测度方法来更加精确地测度研究变量,从根源上确保数据收集的准确性,以提升问卷数据的信度与效度,进而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有效性与概化性。

3. 在数理模型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案例研究。一是正反案例比较分析,将把创业失败企业案例和成功企业案例加以比较,通过正反两个方面对比,分析初始资源对创业路径和创业绩效影响,以尽量避免“幸存者偏差”;二是纵向案例分析,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考察企业在成长不同阶段资源结构演变过程以及对机会来源和合法性战略选择的影响,可能会对初始资源导向路径依赖的内在规律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 注释

① 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得到福建企业与企业家联谊会秘书长曹聪、福建中外企业家联谊会秘书长林斯平、福建青年企业家协会秘书长黄绍庆、福建省职业经理人协会秘书长赵志伟、福建工程师协会秘书长林凯、福建海西创业大学常务副校长黄玉林等大力帮助、支持,在此表示致谢。

## 参考文献

- [1] BARNER J B.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1): 99-120.
- [2] STARR J A, MACMILLAN I C. Resource cooperation via social contracting: resource acquisition for new ventur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0(11): 79-92.
- [3] 王春艳, 林润辉, 袁庆宏, 等. 企业控制权的获取与维

持——基于创始人视角的多案例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7): 144-161.

[4] COLOMBO M G, GRILI L. Founders human capital and the growth of new technology-based firms: a competence-based view[J]. *Research Policy*, 2005, 34(4): 795-816.

[5] 朱秀梅, 孔祥茜, 鲍明旭. 学习导向与新企业竞争优势: 二元创业学习的中介作用[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4, 26(2): 9-17.

[6] 陈明森. 市场进入退出与企业精准战略[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39.

[7] WEICK K E. *Sensemaking in organizations*[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5: 129.

[8] 彭秀青, 蔡莉, 陈娟艺, 等. 从机会发现到机会创造: 创业企业的战略选择[J]. *管理学报*, 2016, 13(9): 1312-1321.

[9] KIRZNER I M.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petiti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307.

[10] SHANE S. A general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the individual-opportunity nexus[M]. Aldershot: Edward Elgar, 2003: 62.

[11] SUCHMAN M C.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3): 571-610.

[12] MEYER J W, ROWAN B.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 83(2): 340-363.

[13] PANT A, RAMACHANDRAN J. Legitimacy beyond borders: Indian software services firm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4 to 2004[J].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2012(3): 224-243.

[14] BAKER T, NELSON R E. Creating something from noth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5, 50(3): 329-366.

[15] 斯晓夫, 王颂, 傅颖. 创业机会从何而来: 发现, 构建还是发现+构建——创业机会的理论前沿研究[J]. *管理世界*, 2016(3): 115-128.

[16] MATHIAS B D, WILLIAMS D W, SMITH A R. Entrepreneurial inception: the role of imprinting in entrepreneurial ac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5, 30(1): 11-28.

[17] ZIMMERMAN M A, ZEITZ G J. Beyond survival: achieving new venture growth by building legitimac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27(3): 414-431.

[18] HITT M A, JACKSON S E, CARMONA S, et a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trategy implementa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9] SIRMON D G, HITT M A, IRELAND R D, et al.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o cre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 breadth, depth and life cycle effect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1, 37(5): 1390-1412.

[20] JAVIER F, MONTES L. Influence of support

leadership and teamwork cohesion o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J]. *Technovation*, 2005, 25: 1159-1172.

[21] GAGLIO C M, KATZ J A.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f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1, 9(2): 95-111.

[22] SUDDAH V R, BRUTON G D, SI S X.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a qualitative lens: insi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or discovery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5, 30(1): 1-10.

[23] PETERS T J, WATERMAN R H. *In search of excellence: lessons from America's best-run companies*[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103.

[24] ENSLEY M E, PEARSON A W, AMASON A C.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new venture top management teams: cohesion, conflict,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2, 17(4): 365-386.

[25] 周萍, 蔺楠. 创业导向企业的成长性: 激励型与监督型公司治理的作用——基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经济管理*, 2015(3): 44-55.

[26] CHANDLER G N, HANKS S H. Founder competence, the environment, and venture performance[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994(18): 77-90.

[27] TIMMONS J A. *New venture creation: entrepreneurship for 21st century*[M]. Homewood: IrwinMcGraw-Hill, 199: 284.

[28] DOLLINGER S J. Need for uniqueness, need for cognition and creativity[J]. *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2003, 37(2): 99-116.

[29] GILBERT A B, MCDUGALL-COVIN P P, AUDRETSC D B. Clusters,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8, 23(4): 405-422.

[30] 苗淑娟, 刘玉国. 创业者特征、融资方式对新创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框架[J]. *中国青年科技*, 2007(1): 12-18.

[31] WATSON L. Building the future of learning[J].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2007, 42(2): 255-263.

[32] 宋晓洪, 丁莹莹. 社会网络、创业学习与创业能力关系的量表设计及检验[J]. *统计与决策*, 2017, 24(22): 89-73.

[33] ATUAHENE-GIMA K, MURRAY J Y.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learning i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on new technology ventures in Chin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2007, 15(2): 1-29.

[34] SCOTT J.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developments, advances, and prospects[J].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Mining*, 2011, 1(1): 21-26.

[35] 王兆群, 胡海青, 张丹, 等. 环境动态性下创业拼凑与新创企业合法性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 2017(10): 36-42.

[36] KOELLINGE P. Why are some entrepreneurs more innovative than other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7,

31(1): 28-40.

[37] 刘佳, 李新春. 模仿还是创新: 创业机会开发与创业绩效的实证研究[J]. 南方经济, 2013, 31(10): 20-32.

[38] 李剑力. 创新型创业和模仿型创业的分类促进政策探析——基于浙苏粤豫鄂陕渝七省市的调查[J]. 学习论坛, 2013(7): 44-47.

[39] ALDRICH H E, FIOLE C M. Fools rush in?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industry cre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4(19): 645-670.

[40] 范群鹏, 程松松. 二元合法性视角下环境信息披露研究评述[J]. 财会月刊, 2018(5): 127-139.

[41] 杜运周, 刘运莲. 创业网络与新企业绩效: 组织合法性的中介作用及其启示[J]. 财贸研究, 2012, 23(5): 121-130.

[42] 刘冰欣. 创业资源、创业机会开发与新创企业成长关系研究[D]. 宁波: 宁波大学商学院, 2017: 98.

[43] 徐伟, 孙永志, 陈剑. 政治资源的经济回报: 基于江

苏常州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江海学刊, 2011(1): 86-74.

[44] PODSAKOFF P M, ORGAN D W. Selfreport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problems and prospect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86, 12(4): 531-544.

[45] 谢荷锋. 组织分为对企业员工间非正式知识分享行为为的激励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7(2): 92-100.

[46] 易丹辉. 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89-92.

[47] 李怀祖. 管理研究方法论[M].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 239.

[48] 张晓, 王永贵, 杨忠. 公司创业精神、市场营销能力与市场绩效的关系研究[J]. 管理学报, 2009, 6(4): 472-478.

[49] 张振刚, 余传鹏. 利用式与探索式学习对管理创新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 2015, 1(2): 252-258.

## Initial Resources, Strategic Fit,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nd New Venture Growth Effects

CHEN Ming-sen LIU He CHEN Xin-ying

(Fujian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of CPC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Initial resources, entrepreneurial strategy and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re important contents of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but many studies often separate the intern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m and direct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above factors on the growth of start-ups, which is difficult to adapt to dynamic and complex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is also in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highly motivate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The paper constructed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nitial resources–entrepreneurial strategy–new venture growth” drawing on the analysis paradigm of resource base theory and then entrepreneurial strategy model was concretized into the selection and combination of new ventures’ sources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nd entrepreneurial legitimacy. A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model was constructed with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variables.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266 new ventures, a regress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analysis showed that: (1) initial resource endowment has a direc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rowth of new venture. (2) The growth effect of strategic model selection is not significant. The consistency and matching degree between the initial resource structure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strategy model have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s on the growth of new enterprises. (3)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is an important moderating variable, bu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different learning styles on different entrepreneurial paths is different and uncertain.

**Key words** initial resources; strategic fit;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new venture growth

编辑 蒋晓